

有关魏源一些史实的澄清

徐少文

咸丰四年(1854)至咸丰六年,是魏源一生中最消沉、最孤独的时期。史料对魏源在这段时间的行踪记录较为简略。因此,人们对魏源晚年生活的去向颇具争议,各种猜测、传闻由此而生。

有人说魏源在这段时间曾回南京“小卷阿”与家人团聚,天王洪秀全重其才,被洪秀全聘为“乡三老”。这种说法主要来源于刘禹生的《世载堂杂忆》和李柏荣的《日涛杂著》以及叶德辉等人的论述。

据刘禹生《世载堂杂忆》记载,被誉为“中国留学生之父”的容闳,十分关注太平天国的发展,于1860年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。天王洪秀全召见了,并授予他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,容闳坚辞不受。在天京逗留期间,容闳曾听说过魏源为太平天国“乡三老”的事,但又特意说明“予未得见”。这“乡三老”指的就是梅曾亮、包世臣、魏源。容闳是1860年到天京会见洪秀全,而魏源于1857年逝世,早已不在人世,足以说明此说值得怀疑。

另据李柏荣《日涛杂著》第一集《魏源轶事》记载:“默深(魏源字)声名既宏伟,又值洪秀全建国南京,提倡文

化,设科取士,乃聘江宁梅伯言(梅曾亮)、泾县包慎伯(包世臣)暨默深为‘乡三老’……(魏源)因侧身洪廷,遂遭平墓之灾,知清室中复后,忌刻南方儒士之深。”李柏荣此说,未注出处,尚无其他史料佐证,不足为据。

那么,究竟魏源晚年是否“侧身洪廷”,受聘为“乡三老”?这个问题一度成为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,很有必要予以澄清。

对于刘禹生《世载堂杂忆》关于魏源为太平天国“乡三老”的传闻,以及李柏荣《日涛杂著》关于魏源“因侧身洪廷,遂遭平墓之灾”的记载,史学界持否定态度。许多专家、学者引经据典作了精辟的论述,如梁启超、郑鹤声、胡玉缙诸家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评说。当代著名学者黄丽镛先生在《魏源年谱》一书中指出:“倘若如李柏荣所记,曾国藩因魏源‘侧身洪廷’,故挖其坟墓以惩儆后人,那么,深受曾国藩信用,被推荐担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收复杭州后,有这么大的胆量去‘掘墓为修墓’吗?尽管左宗棠十分器重魏源的才学,但他断然不会去干这种对曾国藩‘不敬’,对朝廷‘不忠’的事情。”顾云在《邵阳魏先生传》一文中提

到:“(左宗棠)重其以儒者负当世才,掘墓为修墓。”(见《盍山文录》)左宗棠为魏源修墓之事,《清史稿》也有相关的佐证。由此可见,左宗棠花重金为魏源修葺坟墓的史实是真实可信的,也可以说是经过清廷和曾国藩默许的。

1858年,兵部侍郎王茂荫上书咸丰皇帝请求刊印《海国图志》,希望“亲王大臣家置一编,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,以是学”。1876年,左宗棠为《海国图志》再版作序。江苏高邮、兴化,以及邵阳等地先后将魏源列为名宦贤人入祀。

综合上述史料,笔者认为:所谓魏源“侧身洪廷”之说纯属子虚乌有。

诚然,魏源对太平天国起义一直抱有同情、理智的态度,但说他“侧身洪廷”且为太平天国之“乡三老”,缺乏佐证,不足为信。

(徐少文,隆回县魏源研究会会长、邵阳学院客座教授)



◆ 俚语赏释

“田坝凶里的鲫鱼——瞟眼看人” (外三则)

许文华

南方农村的水田,上边田里的水放到下边田里去时,一般在上田与下田共有的田埂上挖开一道小口子,而且比较固定。由于水的长期冲刷,下田靠下水口处被冲出的小窟窿,俗称田坝凶。此俚语本义是指,田坝凶里的鲫鱼斜着眼看人(不正视)。那些歧视别人、看不起别人的人,就如同田坝凶里侧眼看人的鲫鱼,本身也是没有见识的人。

鲫鱼的两眼分别长在身体的两侧,不能正眼视物、视人,与那些看不起人、不正视别人的人在形态上有可比之处。田坝凶范围狭小,而田坝凶里的鲫鱼自然也是见识浅薄。田坝凶里的鲫鱼,随时都可能被人捞走成为他人盘中餐,在这样自身岌岌可危的情况下,还敢不“正视”别人,也包含有说其不知死活的情感在里面。此俚语是对那些不正视别人、看不起别人的人的贬斥,就好像是说:你自己就是一尾田坝凶的鲫鱼,没有见识、自身难保的角色,还敢不拿正眼看人?

“天天待客不穷,夜夜做贼不富”

此俚语本义指,天天以招待客人,(主人家)也不会因此而贫穷;夜夜当小偷去偷别人的东西,(小偷家)也不会因此而富有。此俚语常用来劝诫人们,经常做有利于他人的事,自己不会吃亏;总是干损害他人的事,自己也得不到大的好处。

“铁板钉钉——稳靠”

铁板上钉上的钉子,既稳

固,又坚韧,不会掉落,也难以拔出,所以牢靠。此俚语常用来比喻某人忠诚又办事可靠,或某件事的出现及成败已成定数,不会变化。

能钉在铁板上的钉子,肯定也不是普通的钉子,必须坚硬无比。本俚语既是歇后语,也是比喻句,把事物的可靠比作铁板上钉的钉子那样稳固,值得信赖。别的地方也有“谜面”相同的歇后语,但其“谜底”的侧重不同。如有些书籍收集有“铁板钉钉——硬到家”,其强调的是“硬”。而本俚语强调的是“稳”,是可靠性。

“铁锁锁君子”

此俚语是说,再坚固的锁,也只能锁住财物不让“君子”顺去。弦外之音是,若是“小人”来盗窃,则再坚固的锁也是锁不住的。

本俚语中,“小人”和“君子”是一对相对的概念。此处的“君子”不是指品德非常高尚、很有社会地位和影响的人,而是指守规矩的人、遵纪守法的人。财物相对“君子”是被锁住了,那么相对“小人”是不是“锁”得住呢?

其实本俚语也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:法律、政策、规章保障人们的权益,就像是铁锁锁财物,“君子”遵守法律、政策、规章,而“小人”往往予以漠视。锁要起到锁的作用,重要的还是要防范“小人”。法律、政策、规章再好,也要有严格的执行机制来保障。要让“小人”动辄得咎,法律、政策、规章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(许文华,武冈市作协会员)

◆ 史海钩沉

关于袁吉六的歇后语

陈扬桂

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国文老师袁吉六,系举人出身,晚年回祖居地隆回罗洪养老,被乡亲们尊称为“拔贡老子”。袁吉六是一位有声望、有个性的长者,他的一些事迹常常传颂在人们的口碑间,久而久之,便形成了一些有趣的歇后语。

“拔贡老子开药方——碰运气”

袁吉六多才多艺,诗文自不必说,颜体书法也是拿手好戏,同时他还精通脉理医术。乡里若有人生病,首先就想到请他诊脉开药方。他也乐此不疲,治愈者十之八九。特别是在给贫苦乡亲看病时,他总是不厌其烦,尽心尽力,而且不收分文诊费。但是,他处事低调、谦虚,一边开药方,一边口里念念有词:“我开的这个方子,只是给你碰碰运气,要是病情没得好转,你就不要白跑这里来了!”时间一长,便衍生出“拔贡老子开药方——碰运气”这句歇后语,并在袁吉六的家乡传开了。

“拔贡老子教崽——打一个教一堂”

袁吉六性格有些暴躁,在学校是严师,在家里是严父。尽管他非常严厉,但思想比较开明,无论对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子女,他动嘴的多,动手的少,更不滥用体罚。

在一师时,他有次对学生喝斥得过于严厉,受到毛泽东的批评。他一看批评者是自己喜爱的学生,

就缄口不言了。他对自己的孩子,如果自己正处在气头上,非得对哪一个犯事的孩子动用戒尺时,总要把其他的孩子都叫到一起“受训”。他先要犯错的陈说犯事经过,认错悔过,然后拿起戒尺,狠狠地打他三下,再坐下,气咻咻地说:“气死老子!气死老子!”又起身打三下。如此且打且骂三五个回合,方才罢休。其他几个未挨打的子女,诚惶诚恐地立在旁边,戒尺虽然没有落到身上,但受的教育不比挨打的少。他这种“打一个教一堂”的做法,也是为了减少体罚的次数,增强打一教众的效果。乡亲们对他这样教育子女的方法较推崇,渐渐地,就传出了“拔贡老子教崽——打一个教一堂”的歇后语。

“拔贡老子坐轿——要跌大家跌”

袁吉六告老回乡后,因年岁已高,且腿有毛病,出门都要坐轿。但他身高额胖,而且中途不肯下轿,所以袁宗仁、刘善高、陆文保这三个“力汉子”轮换着抬,才奈得何。

可是有一天,这三个力汉子没得空,临时请了三个力气小一些的新手来抬轿。过小溪时,轿夫怕失脚踏落水,请他下轿步行。袁吉六说:“你们不要怕,要跌大家跌。”果然不出所料,轿夫一脚踏空,连人带轿跌入溪中。袁吉六落水后,也不气不恼,爬起来拧干长袍上的水,又往轿里钻。袁吉六这一跌,跌出了“拔贡老子坐轿——要跌大家跌”的歇后语。



兔儿尾苗

刘玉松 摄

《邵阳日报》与我的漫画生涯

李化球

1984年,《邵阳日报》创刊。当年,我的漫画《无题》入选了第六届全国美展。

1986年,《邵阳日报》在报道新当选的邵阳市第九届人大代表时,提到了我的漫画获奖情况。

1987年,我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的漫画《在是非面前》,获得湖南省新闻漫画一等奖。

在1988年《邵阳日报》优秀通讯员表彰会上,刘雄成老师对我进行了采访。之后,他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文章《笑的艺术:李化球和他的漫画》,作为1988年2月27日《邵阳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。这实在让我受宠若惊。

1997年,聂荣华老师采写了《李化球与漫画》一文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,此文后被编入《宝庆艺苑精英》一书。

经仔细查阅得知,《邵阳日报》从1988年至2002年连续15年举办了漫画比赛。比赛时间之长,参赛人数之众,发表作品之多,在全国也是十分罕见的。总编刘雄成,以及罗苍诗、刘红兵等老师为比赛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。为寻找协办单位并取得赞助,他们四处奔波。1995年开始,比赛进一步面向全国。每逢年终,报社一般邀请赵夫老师、刘耀辉老师,包括我一起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,然后邀请漫画名家

如朱根华、常铁钧、谢丁玉、庄锡龙等老师进行复评,评出获奖作品。15年的漫画比赛,给了我创作漫画的动力,也给了我学习提高的机会。在比赛中,我有15幅漫画获奖,其中《保护色》《头上沾了三滴露水》获得一等奖。

刘雄成老师不但喜爱漫画,而且是鉴赏漫画的行家。1999年,他带头写了一篇漫画赏析文章,然后要求我们漫画作者来写。这一担子主要落在了我的肩上,这也给了我锻炼写文章的机会。漫画赏析文章一般也就三四百字,发表在报纸的第一版。对我的这些小文章,刘雄成老师一般未作改动。但也有例外:在一篇关于讽刺“伸手派”的漫画赏析文章中,他给文章加了郭沫若为蒲松龄故居题写的一副对联:“写鬼写妖,高人一等;刺贪刺虐,入骨三分。”这不仅为文章增色不少,而且收到了画龙点睛之效。

去年以来,我写了一些有关漫画创作心得体会之类的小文章,并陆续刊发了出来。由于我的文字功底浅薄,加上年老思维迟钝,文章多有疏漏甚至谬误之处。好在编辑人员审稿仔细认真,对文章内容、遣词造句等都能把好关,才不致以讹传讹。对于编辑老师们这种为他人作嫁衣的高尚

情操与敬业精神,我十分钦佩。

说到我与《邵阳日报》的情缘,就不能不提到《邵阳日报》的前身《资江报》。

1951年,我正在邵阳市二中初中二年级读书。同班同学严农,也许是受他父亲——著名报人严怪愚的影响,开始向报刊投稿。他的一首长诗发表在《新观察》杂志发表了。在严农的影响下,我也跃跃欲试,向《资江报》投稿。我写了几首童谣,如今只记得其中一首的开头两句:“栗树柴烧火必剥剥响,鼎罐里红薯喷喷香……”令我喜出望外的是,这些稚嫩之作竟然见了报,登上了大雅之堂。此后,我们几位同学还与美术老师栗干国(又名栗实)合作,在《资江报》发表过连环画。这是我永远难以抹去的记忆。

今年是《邵阳日报》创刊40周年。40年中,我在《邵阳日报》以及《邵阳晚报》发表漫画200余幅,漫画赏析等文章100余篇。《邵阳日报》对我的漫画创作及文章写作,给予了满满的关爱、信心和力量。对此,我表示由衷的感谢,祝《邵阳日报》越办越好!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
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有奖征文